

程应镠史学文存

程应镠 | 著

南北朝史话

范仲淹新传

司马光新传

流金集



程应镠史学文存

程应镠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程应镠史学文存/程应镠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222 - 8

I. ①程… II. ①程…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0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3531 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封面设计 储 平

技术编辑 伍贻晴

程应镠史学文存

程应镠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43 插页 4 字数 788,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222 - 8/K · 1671

定价 80.00 元

程应镠评传（代前言）

虞云国

程应镠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历史教育家，青年时代相继在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学习，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而后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在昆明与上海投入民主运动。1949年以后，程应镠先后在中学与大学担任组织领导工作，他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也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者。他的史学成就、教育业绩与人格精神，是留给史学界与教育界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一、得失久谙关世运：生平事迹

1. 斗争文字疾风雷：1949年以前

程应镠，1916年11月4日（农历十月初九）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这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但到求知时，他的思想和知识已完全受其惠赐了。程家是当地大族，他的太高祖程裔采，历任江苏、山东、云南巡抚，云贵、湖广总督，同族的程樛采也官至安徽巡抚。他的父亲程懋琨（后改名觉吾）先后在河北和江西当过县长，母亲况葆琴是一个旧式妇女。五岁那年，他入私塾读书，私塾设在家中的望庐楼，读的是《四书》、《左传》和《古文观止》等古籍。在望庐楼里，他接受了六年旧式教育。祖母是幼年对他影响最深的人，经常给他讲家史，希望他成为太高祖那样公正清廉的官吏。

1928年，程应镠去南昌，半年补习完考中学的课程。次年考入江西省立二中，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的读书面大为拓宽，生理卫生、植物学都使他感到前所未闻的惊异。1932年，他以成绩优良免试直升本校高中，就读理科。南昌当时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教育也颇受这一运动的影响。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风岛社”，开始向刊物投稿。1933年，他写过一篇《我们的西北》，投寄给在南昌出版的《汗血周刊》，次年正式发表，时仅十九岁。因新任教务主任有意为难，指责他和几个同学不服管教，1934年，他被迫转学到南昌私立心远中学。这个学校的历史教师讲中法战争，讲甲午战争，讲戊戌变法，常讲得流泪，而他也听得流泪，影响之下，喜欢上了历史，决定弃理学文。

1935年夏天，20岁的程应镠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秋天，他负笈北上，赋诗说“异乡月好不须圆”，抒发了开拓新生活的豪迈胸襟。一入大学，他就如饥似渴地沉溺于俄国小说、古典诗词和《世说新语》之类的著作中。然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受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渐渐感到蒋介石所说的抗日是靠不住的，便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成为12月16日示威游行的先锋队队员之一。他后来回忆：“一二·九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过去不敢喊的‘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的口号，十二月九日那天，我高声喊着，一边喊，一边淌着滚热的眼泪。”以后的3.31、6.13几次示威游行，他也都参加了。

1936年年初，程应镠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这年，燕京大学成立了“一二·九文艺社”，他成为负责人之一，主持名为《青年作家》的文艺刊物。当时大家都希望得到著名作家的支持，推他作代表去找沈从文。于是他初谒这位倾慕已久的作家，沈从文为《青年作家》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长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词》。其后，两人保持着终生的交谊。这年春夏之际，他与燕京大学同学王名衡、刘春发起组织“大学艺文社”，出版《大学艺文》的杂志。他还代表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和“大学艺文社”，参加由清华大学发起组织的北方文学社成立大会。他当时是艺术至上论者，强调写什么都可以，但必须“情欲其真，景欲其切”，才能打动人心。这一主张，遭到刘春的尖锐批评，撤销了他出席“北方文学会”的资格。这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年底，参加上海妇孺慰劳团赴绥远，同行有柯华、周游、李植人、李植青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程应镠留在北平，一度想去西山找游击队，没有成功。8月初，他经天津至秦皇岛，由海道在8月12日到上海。次日转乘沪杭车至嘉兴，由苏嘉路经苏州到南京。在南京居留月余，参加过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工作。9月中，他离开南京，回新建故乡小住数日，即由九江去汉口，借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与赵荣声、刘毓衡（即陈其五）办过一份叫作《活报》的刊物，仅出了一期。12月，因范长江的介绍，他到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工作，主要编印团宣传科发行的一种油印报，开始使用流金的笔名。这年，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离散之前》《平津道上》、《记绥远》、《给一二·九运动中的朋友们》等文章，真实反映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人民的流离失所和慷慨纾难的情景。

1938年4月，柯华从八路军总部来到686团，他打算搞一个火线通讯社，刊发八路军战地消息和照片，邀请程应镠参加。征得领导同意，他们同去延安。延安有关方面同意他们去武汉，一方面向国民政府办理通讯社的登记手续，一方面采购通讯工作所需的器材。南下途中，在耀县碰到周游，便邀他一道参加通讯社工作。5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他们，认为国民党不会批准通讯社立案的，要求他们等延安电示再定行止。在武汉待命期间，程应镠写了一些记述八路军抗战的报道、散文和小说，主要有《汾水的西岸》、《我们怎样在这里生长着》、《黑夜的游龙》和《姑射山中的风雪》等，他还以八路军的战地生活为题材，写过一本名为《一个士兵的手记》的小书。6月底7月初，他趁待命的机会回家省亲，在故乡组织大塘读书会，举办过农民识字班，教唱救亡歌曲，刷写抗日标语，还演出过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其后，读书会有些成员分别去了延安和新四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当他返回武汉时，柯华、周游已奉

命北返，他便由江西经湖南、贵州辗转到昆明。

自1938年9月起，程应镠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为以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大约十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创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第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执笔，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题为《哀联大》，诗中有讥讽，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这批年轻学子，对联大也不满意，与前线血肉搏战相比，这里犹如一潭死水，他们渴望波澜壮阔的生活。课余，程应镠继续向报刊写稿。1939年，因沈从文推荐，他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的编辑工作，结识了凤子和孙毓棠。不少联大的学生在这一副刊上发表他们的处女作。他自己也发表了《秦皇岛上》、《副官》、《故乡小景》和《潞江小记》等大量文学作品。他在联大两年，除了学习，便是写小说和散文，内容多与抗战有关，也充满了对故乡的思恋。这些文章，一部分收入《一年集》。这个集子作为章靳以主编的《烽火丛书》的一种，1940年由沈从文推介出版。1949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其列入《文季丛书》改版重印。

1940年夏天，程应镠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之前，他已在联大所属师范学院003的史地研究室参加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师范学院有意留他担任助教。就在这时，燕京大学同学赵荣声从洛阳来信，他当时是共产党员，正在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当秘书，希望程应镠也去那里。于是，程应镠决计重返抗战前线。8月初，由昆明间关赴洛阳，行程十分艰苦，从重庆到宝鸡几乎走了一个月。到西安时，他因痢疾猛袭，几度昏迷，多亏途中结识的国民党某军副师长蔡剑鸣将他送入医院，才转危为安。到达洛阳后，他担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同上校秘书。1941年夏季，转入第一战区第13军任同上校秘书，仍驻洛阳。这一期间，他到过叶县、郑州、登封、密县、新郑，招待过记者，参观过名胜古迹。工作之余继续小说、散文、旧诗的创作，有的寄到重庆《大公报》，有的则在洛阳《阵中日报》和《北战场》上发表。在《北战场》上，他发表了长篇小说《京儿与小庆》的部分章节。洛阳的军旅生涯离他的追求相去颇远，他在诗里抒发内心的不满：“萧条山市堪沽酒，寥落军书好醉眠”；“何时弃此冷官去，独向湖边赋索居”。同时，他对抗战前途和民生疾苦依旧投以殷切的关注：“民困应知征调久，边烽频报捷书迟。诸公好画平戎策，莫任苍生靡孑遗！”

1942年年初，他为了营救军中一位受迫害的女译电员，避居13军在临汝的办事处。3月，化名上官灵亡命安徽太湖县，匿居赵荣声故里半年有余。在大半年避匿索居的日子里，他读了《宋元学案》等大量史籍，一种对历史专业研究的向往之情时时油然而生，《病余》一诗反映了这种心境：

病余岁月似还山，得意希罗古史间。
 损益可知千载事，蹉跎已负一官闲。
 希罗多德真吾业，恺撒庞贝失旧颜。
 怀古怀人情不浅，短灯挑尽意犹慳。

10月，他结束避难，返回洛阳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张雪中的私人秘书。1943年初，他将战区政治部所属抗日宣传演剧一队和原13军政工队的演员合并，成立了《北京人》剧团，在洛阳连续演出《北京人》一剧达20天。后来还准备排演《蜕变》，被政治部主任秘书等造谣诬指为共产党。见洛阳已难立足，而赵荣声夫妇正从太湖经过洛阳去成都燕京大学复学，程应镠便与他们同赴成都，然后经重庆去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任国文教师。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今后将转向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当时他很满意自己的角色转换：

三年奔走空皮骨，到此能安且作家。
 止酒不愁贫无俸，著书可待笔生花。
 溪山有约行千里，学殖何须富五车？
 羁绊一官抛弃早，报书应向故人夸。（《三年》）

1944年8月，程应镠与李宗蕓在贵阳结婚。不久，他携妻移居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助教，并在私立天祥中学任教。因丁则良的介绍，他与闻一多、吴晗相识，和民盟发生了关系。由于吴晗的介绍，他与丁则良虽都不是盟员，但参加过民盟邀集的座谈会。《民主周刊》发行后，程应镠写过《一二·九回忆》和《一个十九岁的上等兵》等文章，都是交给闻一多，由他拿去发表的。1945年6月起，因沈从文的关系，他开始编辑《观察报》副刊《新希望》。闻一多认为这个副刊脱离政治，不赞成他编这样的副刊。闻一多和沈从文原来是老朋友，这时，闻一多转向激进，认为沈从文还是老一套，没有进步。程应镠对两位师长都十分尊敬，认为他们都是好人，还打算调和他们的关系。回顾程应镠后来的治学与为人，不时可以看到这两人对他的深刻影响，追求慷慨壮烈的事业与向往萧淡自然的情趣，是他性格深处看似矛盾却依傍共生的一对因子。

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政治现状并不符合程应镠所追求的民主社会的理想。这年岁末，昆明“一二·一事件”深刻教育了程应镠，他与广大学生一起投入了民主运动。1946年，他曾任天祥中学训导主任。不久，学校迁往距昆明七、八里地的小坝，迁校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他请当时在校任教的冯契写了一首迁校的歌词，以后成为这个学校的校歌。他在天祥中学时，向学生大力宣传“独立不惧，朴质自然”的人生精神。1946年4月，闻一多希望程应镠也能和他一样勇敢地过

问政治，他因而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7月16日，闻一多被暗杀的次日，他去医院瞻仰了尊敬的师长的遗体。他后来指出：“这件事对我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对国民党反动派如此无耻地暗杀一个正直的学者，充满了愤恨。”一时传闻他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学生协助下，他只身匆匆飞抵武汉，把妻儿都留在了昆明。在武汉等待亲人的日子里，他写诗吊唁闻一多，抒发他的哀悼和愤慨：

西南漂泊佳人死，忍泪脱从虎口来。

契阔死生诚梦寐，斗争文字疾风雷。

望门投宿思张俭，酹酒临江吊楚囚。

家国陆危忠义绝，江声东去隐沉哀。

8月，程应镠挈妇将雏回乡探亲，1947年2月由故乡抵沪，任新陆师范学校教员。8月起改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在这里他结识了孙大雨和戴望舒。这年秋天，他们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上海教育界当时发表支持反饥饿、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的宣言，他与大教联成员都签了名。9月起，程应镠兼任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的训育主任，因站在学生方面与贪污学生伙食费的校长董任坚作斗争，11月被当时的市教育局撤去兼职。从9月起，他兼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为生计所迫，他还在培明女中和越旦中学兼课。1948年，因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解聘，但仍在法政学院任教。这年9月起，因张芝联介绍，聘为私立光华大学副教授，继续参加民主运动。1949年春，他由尚丁（孙锡纲）接上了民盟上海市组织关系。4月的一天，他正在光华大学上课，有人告诉他，国民党在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贴出逮捕的名单，第一个便是他。他当即去找张芝联，请他用光华的车把自己送走。他蛰居了将近两个月，除了几个最亲近的人，谁都不见面。从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间，他在《中国建设》和《启示》等杂志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路》、《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论持久和平》、《民主主义的真谛》、《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等长篇政论，还写了《帮忙与扯淡》、《痴人说梦》和《停战乎？和平乎？》等杂文，宣传民主政治，抨击专制独裁，揭露国民党的和平阴谋。在避难的日子里，他迎来了新旧政权的更迭。

2. 报国谁知白首心：1949年以后

对新政权的诞生，程应镠当时是由衷高兴的，有《闻解放军云集江岸喜成一绝》。1949年5月，程应镠仍在光华大学和法政学院任教，还担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他后来被任命为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过组织委员会的副主委，积极参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动。例如，7月15日纪念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大会，他不但参与了筹备工作，还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与此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杂志《展望》周刊也被军管会批准复刊，他也参加了《展望》周刊的工作，当时《展望》

的负责人是尚丁。在复刊第1期上,他写了欢呼上海解放的社论。自7月底8月初起,他担任了《展望》周刊的编辑部主任。

1949年9月,上海市高教处指定程应镠担任光华大学的政治教授,同时,上海市军管会中教处派他前往高桥中学任校长。次年年初,他辞去《展望》的编辑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专任高桥中学校长。他平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办刊物,二是办学校。出长高桥中学,满足了他办学的宿愿。他本来就有一套办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桥中学,便把这些主张付诸实现。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之下,他从办公费中节拨款项,购置图书。其后几年,图书费成倍增加,学生已能在图书室里阅读到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他努力贯彻“教学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标准。到任不久,他还抓了学生劳动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短短数年,高桥中学就成为闻名沪上的浦东名校。

1951年2月,在仍任高桥中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的同时,教育局一度命程应镠兼任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秘书长,负责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在暑假后就辞去这一兼职。这年冬天,教育局组织部分中学的行政负责人和教师去安徽宿县参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县王堂村工作了一个多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他辞去了原先兼任的光华大学的教职。这年,他参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学习,通过以后,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桥中学的高中政治教员。思想改造运动,是新政权成立以后第一次触及旧知识分子灵魂的政治运动,树立了执政党的绝对权威。程应镠感到自己不是党员,不适宜做行政领导工作,几次向教育局辞职,打算回高等院校搞教学和科研,都未获准。1953年,他写了《屡求去回高校任教不获忽四年矣因春感赋一律》,表达了自己在社会变动新旧交替之际的喜悦、迷茫和追求:

万里春风喜莫加,卅年委运恨如麻。

回天力已成诸夏,起死恩今感万家。

快意恶除萧艾尽,会心人惜蕙兰花。

自怜才薄当斯任,有志难谐鬓渐华。

1954年暑假,他从高桥中学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历史科主任。在其后三年间,他代理过一年教务主任,担任过校工会主席,但主要负责历史学科的建设工作。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成立,程应镠出任历史系主任。这年,他当选为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当双百方针提出时,程应镠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主张来诠释这一方针。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解,使他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而终于运交华盖。在一次民盟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公开批评说:“学校现在权威太多,党委书

记是权威，校长是权威，一级一级的领导，都是权威，只有教授不是权威。而学术问题，真正的权威是教授，是每一门的专家。不去掉这些权威，学术就不能发展。”1957年鸣放期间，他大力宣传北大民主墙，认为这是一个新五四运动。反右斗争开始后，费孝通在报上被点了名，许杰也在上海被点了名，他在公开场合认为许杰在民主革命中是左派，不会是右派。还说：“倘若这样，以后知识分子都不能讲话了。”不久，他自己也被点名划为右派。他坚定认为自己并没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和某些党员干部相处不好，只是个性脾气，决不是反党。他声明：“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当右派。”但一个知识分子在狂暴的政治风雨面前，是多么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他也想到过自杀，只因儿女尚在童稚，才没有走这条绝路。直至这年8月底，在强大压力下，他见一向比自己进步的一些朋友也都沦为右派分子，才被迫承认自己是右派。从7月份起，他被免去历史系主任的职务，入资料室工作，等待所谓处理结论。

1958年9月，程应镠参加了由上海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的部分右派分子劳动学习班，地点在上海县颛桥乡。1959年2月起，他又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的“学习”。7月结业，回上海师院历史系工作，从教授贬为中文系马茂元等人的助教。007仍须一方面在校学习，一方面在市委统战部和民盟市委学习，每月还必须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这种汇报持续了三年。在这些阴霾的岁月里，他几乎每天都写思想改造日记，自题为《严谴日记》。1957年以后直至1960年摘去帽子，他除了和母亲、姐弟还偶有通信，与一切朋友都音问俱断。工资已被割得难以养家糊口，1959年之后，为贴补家用，家里的藏书一批一批地卖去，所剩已经无多。这对以学术为生命、以图书为资粮的学者来说，是最不堪忍受的。

1960年9月，程应镠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允许正式授课。他感到作为教师还必须有点真才实学。从1961年秋天开始，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如何重理旧业，掌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资料，为著书立说作准备。他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准备作论文。从1962年起，他因原任民盟市委委员，就不再在学校进行政治学习，而是直接参加由民盟上海市委组织的政治学习。直到1965年春夏之际，他才由民盟市委通知仍回学校学习。这一期间，只要一有余暇，他就埋头于史学研究，尽管当时没有学术刊物会发表他的文章，但他还是陆续完成了《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魏晋南北朝民族略论》和《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等论文。他有一首诗反映了在政治运动的夹缝里偷闲治史的情景：

少逐声名翰墨场，晚于青史识苍凉。

九年蝶梦迷归路，三斛纯灰净秽肠。

绿色侵帘瓜豆蔓，好风穿户午荫长。

夜窗卧看星河落，清露无声枕簟凉。

由于周游和吴晗的促成，约程应镠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选作《南北朝史话》。1963年，他写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他：“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写作过程中，吴晗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吴晗都明确表示了意见。1964年春，《南北朝史话》完稿，不久看了三校样。1961年和1962年，对于历史问题，不同意见屡见诸报端；1964年初夏，学术界正在酝酿一场大批判。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程应镠对当时讨论或批判的历史问题，是有自己想法的。经过《史话》的写作，这些想法更为明确，他很想为《史话》写一篇序，阐述自己对有关史学问题的系统看法。但这个念头只在脑子里转了一下，便放弃了。书稿交出半年之后，这年初冬，终因政治大气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年9月，程应镠参加上海师院农村学习访问队，去松江城东公社学习访问，住了40天，参加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一些会议，主要是成立贫协的会议。访问结束时，学院领导号召写家史，他也参加了两篇家史的讨论，写了部分初稿。回校不久，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他以为吴晗的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也希望是个学术问题。但在表示意见时，却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能再犯错误。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晗与胡适》，他不仅感到吴晗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预感到又一场阶级斗争风暴的来临。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能够保住平安，被迫把吴晗1963年的来信交给了历史系党总支。

风暴终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他每次去看大字报时，总是担心大字报会集中揭露自己的问题。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他主动交代了和吴晗的关系，和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师院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图书和诗稿，还准备烧毁文物陈列室的珍贵藏品，把他与魏建猷和张家驹等人挂牌游斗、沉重的铁质游斗牌压坏了他的颈椎神经。他认为红卫兵全面地否定过去的文化“太过分”，也“不合法”。运动初期的惊涛骇浪过去以后，他作为牛鬼蛇神被送到学校附近的桂林二队劳动改造。每天，他送蔬菜去市场，到梅陇镇去拉砖瓦，去七宝镇车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宝路上拉粪车……。这一期间，他与亲朋好友都断绝了往来。晚饭后，和妻子一灯相对，唯一可以排闷的，便是读书。从中学便已熟读的《资治通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伴侣。他常常是坐在破沙发上，翻到哪里，就读下去，时而沉浸在历史之中，忘记了一切，时而古今对读，发出会心的苦笑。

1968年元旦，程应镠是在写检查交代中度过的。这年5月，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也没完没了地写交代，现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计就有十余份。1969年2月，他一度被隔离审查。4月12日写了长达20页的“罪行交代”，约25000余字，三天后，续写“我的交代”，约万言。当月，他被“解放”。5月，参加“教育改革探索小分队”赴横沙岛。连年以来，揪斗关押，惊魂不定，面对横沙岛上的风雨怒涛和雁月夜窗，他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海上涛来云似墨，天边雁字月如霜。

夜窗犹忆惊风雨，老眼婆婆泪万行。

大约从这年岁末起，程应镠转到松江佘山劳动。1970年5月，转赴江苏大丰“五七干校”，继续那种无休无止的改造和学习。

1971年，上海师范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等五校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这年4月，工宣队发还抄家取去的书物，而程应镠所珍爱的诗稿本却不见踪影，于是他凭借着记忆默录出部分旧作。10月2日，他为默录的诗稿写了一段跋语：“韶龄学诗，至今四十余年。自二十五岁至五十岁，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取去。当时窃惟革命人们可以据此审查我的一生，因其中颇有与时事有关者，即友朋答赠的篇什，也可见交游。这种东西，本来是应当烧掉的。为了使儿女从这里取得一些教训，则还有可以保存的理由。我这个人自幼读孔孟之书，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润。在洛阳，虽有忧愤，但仍幻想改良。在昆明，忧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灭了，却仍然拒绝到工农兵中去。‘北去南来’、‘东行西上’，固实有所指，但也不过是对朱颜失去的怅惘而已。《寄宗槩》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写实，仍旧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过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但跋语强调“读其诗，想见其为人”，“重录了这些东西，不免和它们一同回到了过去的日子”，肯定诗草对了解其人其事的价值。这些诗草与他在1949年以前的小说、散文、报导、杂感和政论，后来大都收入《流金集·诗文编》。

从1972年起，程应镠结束了在大丰“五七干校”劳动，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二十四史标点组，先后参预标点了《宋史》、《尉繚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标校完毕，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标点组开始标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

十年动乱中，程应镠私下里只与魏建猷、张家驹仍有往还，患难之中保持着十分感人的友谊。1973年，他们三人还结伴携妻出游苏州，成为那黯淡的岁月中鲜见的亮色。1976年春天，天安门事件的消息传来，他有《丙辰清明偶成》，表达了对政治阴晴的密切关注和乐观情绪：

日里几番晴雨晦，夜来月色暗还明。

黄梅时节江南客，头白昏昏醉复醒。

10月，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也有诗纪事道：

谁知覆雨翻云手，搅得周天阵阵寒。

易直果能当大事，未须甲兵即平安。

易直是宋代大臣吕端的字，他一向被视为“大事不糊涂”的名相。程应镠谙熟宋史，他预感到一个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即将过去。

1977年，程应镠仍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该标点组后来改为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月，他应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为十余年前的旧稿《南北朝史话》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华已经21年，见到阔别已久的师友，抚今追昔，既感慨，又高兴。在北京的50天里，他往往上午校改书稿，下午去访寻古迹，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约有两次去小羊宜宾胡同探访沈从文。他还去探望了吴晗的遗孤，吴晗是促成他写《南北朝史话》的师友之一。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他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吴晗的诗：

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

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

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

劳人还草草，寂寞待春归。

诗的意思很明白，但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当时，他还不敢轻易示人。

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首届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入学，同年四月，上海师范学院复校。这年岁末，程应镠改正右派错划，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为历史系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同时，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兼职也日渐增多。1979年，程应镠被选为新一届的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成为全国第一批恢复招生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这年3月，他在为即将出版的《南北朝史话》所作的《后记》里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还应当在我的晚年为我国史学作出一点什么来。”他确实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的，迎来了自己学术和事业的最后收获期。写完《后记》，他赶赴成都参加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宋史研究会，并推北京大学邓广铭、暨南大学陈乐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酆家驹和上海师范学院程应镠组成筹备小组，责成上海师院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2月，他去天津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会议，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同被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主编。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决定分卷出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希望宋史卷能作为断代史的第一部在1983年

出书。会后,他全力投入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的组织工作。10月,他与邓广铭、陈乐素发起组织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和上海师范学院举行成立大会。会上,他代表筹备小组介绍了宋史研究会的筹备经过,并被选为秘书长,主持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工作。这年,他开始为撰写《范仲淹新传》作前期准备。

1981年,程应镠完全摆脱学校里的工作,夜以继日地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审稿、定稿。1982年4月,他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疗,但梦牵魂绕的却是尽量夺回十年浩劫损失的时光,为史学研究多做贡献。他有两首诗最能说明这种心境:

忧患余生最自珍,病魔潜袭已兼旬。

文章又见流传日,议论终须不傍人。

得失久谙关世运,荣枯每惧损天真。

菊花三月江南夜,怀远思亲一怆神。(《友人问疾诗以答之》)

老去移山志未伸,汝曹宜自惜青春。

传经我爱他山石,报国谁知白首心?

秋入园林思塞马,梦回长夜忆青襟。

登临敢说兴亡事,太息当年苦避秦。(《示儿》)

盛夏出院,程应镠继续擘划《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有关事宜。与此同时,他进一步着手《范仲淹新传》的写作准备工作。盛夏休息在家,便浏览家藏的宋人笔记,有关范仲淹的则随笔录下。约10月开始,作范仲淹传记长编,断续花了一年时间。

1983年,程应镠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长,并把上海师院的古籍整理专业建设成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点学科之一。10月,他赴昆明参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并与妻子重游昆明、贵阳等旧地。返沪后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参加纪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西南之行,故地重游,令他感慨和兴奋,为此他写了一组《重游西南杂事诗》。江西是他的故乡,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欧阳修和陈寅恪,以“气节文章堪继往,江山人物自开颜”的诗句来颂往勉今。他频繁地参加各种重要的学术活动,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癌症初愈的年近七旬的病人。这年秋天,他开始写作《范仲淹新传》。写作之前,他对怎样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考虑了很久。上海师院校庆,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10月去贵阳,在贵州大学又讲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的征文约稿函,便写了《谈历史人物的研究》。《范仲淹新传》的写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论述思想的一次实践。

1984年初夏,程应镠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被聘为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他还是上海市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这年10月,上海师范学院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1月,程应镠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是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成都成立,他与谭其骧、周一良、唐长孺、何兹全、王仲荦、缪越、田余庆、韩国磐、吴泽等同被推为顾问。这年岁末,由他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出版面世。这年,为推动海内外宋史学术交流,他还创办了《宋史研究通讯》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会刊,并题写了刊名。1985年7月,《范仲淹新传》完稿。1986年4月,他赴杭州大学参加国际宋史讨论会。月末,赴贵阳参加清华中学恢复旧名活动。10月,《范仲淹新传》出版,自去年定稿后即着手《司马光新传》的写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名誉所长。1987年9月,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增补为副会长,仍兼秘书长。

因十年浩劫中被揪斗时伤及颈椎,颈椎压迫症引发多种疾病而住院治疗。这时,他的《司马光新传》已经完稿,惟传主事迹著作编年仅成其半,征引史料也未及覆核,遂委托助手完成。自此,他久困病榻。卧病期间,偶以笔墨书录昔年所作旧诗。1991年8月,《司马光新传》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一丝快乐。1994年7月25日,程应镠病逝于上海寓所。

二、历史教育家的成功实践

1. 历史教学

相对于历史学家的声名,程应镠更重视他作为历史教师的身份。他多次对人说过:“我首先是一位教师,不是什么学问家”,可见教师生涯在其人生历程与自我评价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中学校长到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历史教育园地里耕耘了半个世纪之久,培育桃李无数。任何时候,在他身边都会聚集着一群青年学子,平时,他关心他们的学业和为人,关键时刻,他总是忘我地保护他们。他在传道授业的同时,以自身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力量,教育、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作为长期从事师范教学的历史学家,程应镠对历史教学和学生培养有自己的见解和特点。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学生对历史课没有兴趣?他以为,学校对历史教学不重视,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得不好,历史教师缺乏专业训练,等等,都是导致学生不爱上历史课的原因。而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历史教学和研究又直接影响着中学历史教学。因此他特别反对把历史研究与教学简单化,“简单化的结果,就使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剩下几条筋,无血无肉,干瘪得像瘪三,青少年是不会有兴趣的。”他还反对以一成不变的理论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贴标签,在他看来,贴标签

“是不会有说服力的，就会使得学生以为历史味同嚼蜡”。他主张历史课可以通过讲人物，使学生了解过去。比如讲秦汉，就要讲秦皇、汉武，项羽、刘邦，陈胜、吴广；讲均田制，就要讲文明太后、魏孝文帝；讲改革，就要讲王安石、司马光；讲淝水之战，不能只讲战争性质、双方力量对比，要讲苻坚、苻融、谢安、谢石……通过人物的讲授，使历史课变得津津有味，才能使学生从中获得教益，否则，“要激动青少年的心大概是不可能的”。

程应镠在大学先后讲授过世界史、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国学概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很多学生说，听他讲课，如同一种艺术享受。他的历史课既有理论上的开掘拓展，又常常在关键处旁征博引，中西比较，信手拈来，适时点化，使学生在豁然开朗、欣然有得中感受其中的深度和广度。他讲课时，感情十分投入，有时激越雄辩，使人奋立；有时深沉低徊，令人感慨；或描摹人物，或引据诗词，高屋建瓴又挥洒自如，把学生带入应接不暇的不同境界。20世纪70年代末，他曾为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中国通史，大梯形教室为之爆满，以致走廊、门厅处都临时加座。他对自己的历史教学的最高要求是：“每上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深度和魅力浑然一体的教学境界，数十年中，他始终要求自己把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走上讲台却又不带讲稿，其中，需要付出多少创造性的艰苦劳动！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要上好历史课，最主要的还是学习，比在大学读书时还要学习得认真，为培养人而学，为未来的建设者而学，为那些将来要超过我们的人而学。”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不懈的追求，正是他几十年历史教学常讲常新的源泉所在。

2. 筚路蓝缕创建历史系

程应镠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创立者。1954年7月，他从高桥中学调至正在筹建中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出任历史科主任，负责创建工作。1956年，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分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与上海第二师范学院，程应镠担任第一师院的历史系主任。直到“反右运动”以前的短短三年间，他筚路蓝缕，不辞艰难，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历史学科的创建上。在此期间，程应镠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组建精干出色的师资队伍。

到任以后，程应镠一方面凭借自己广泛的学术关系，引进了不少骨干力量，包括著名的宋史专家张家驹，出身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季平子、朱延辉，还有李旭等教师，另一方面，他倚重比他略早到来的魏建猷，并把师从贺麟与金岳霖的徐孝通从中文系调入历史系，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人才大都出身于清华、北大、联大或燕京大学，当时颇有议论说程应镠用人只重学识，不重政治。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教师，构成以后上海师院历史教学与科研的领军人物。

其次,创建服务教学的图书资料室。

当时,诸事草创,资料室缺少基本图书,程应镠通过关系,购买了诸如《明实录》、《册府元龟》等基本史籍。为了加强图书、资料、教具的建设,他一方面从当时的地图出版社聘请专职的历史地图绘制员,为历史教学绘制挂图,一方面物色了徐先麟、吴秉文等专业翻译人员,从事外文史料的翻译工作,为世界史教学与科研服务。这在当时,是相当有远见与魄力的举措。即便在被迫等待所谓“反右”结论时,程应镠为了资料室的建设,仍不计一己之荣辱,主动提议整理先前购入而未及整理的碑帖。他在“交代检讨”间隙,白天赴上海图书馆查核资料,入夜则伏案运思,挥毫作跋,终于一帖一跋,悉数完稿,交系资料室存用。

最后,筹备藏品丰富的文物陈列室。

与此同时,他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实物,于是开始筹建历史文物陈列室。程应镠首先向学校领导力陈文物在历史教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争取到一万元作为文物收购经费。然后,他通过已转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自己的老师沈从文,托他在北京收购博物院不拟收购的文物。当时文物收购价格低廉,再加上沈从文的关系,许多有价值的教学文物陆续从北京运来,入藏我校的文物陈列室。他还邀请沈从文来校,对文物陈列室与文物管理员作了具体的指导。沈从文也因程应镠的关系,把他自己珍藏的乾隆宫纸与数种丝织物赠给了我陈陈列室。1957年,文物陈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现已改建为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

反右运动以后,程应镠被迫离开系主任的位置,这时候,历史系的建设已奠定了基础,初具了规模,走上了轨道。他对接任系主任的魏建猷说:“我们关于历史系教学工作的想法是一致的。由你来接手,我就放心了。”即使在遭到不公正对待时,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历史系的建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历史学科,程应镠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3. 为振兴历史系而殚精竭虑

1957年反右以后,直到1978年复校以前,程应镠被剥夺了教学与科研的权利,当然更谈不上对历史系建设的发言权。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随着首届历史专业本科生的入学,程应镠也复出工作。这年岁末,他被改正所谓“右派”错划,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主任为魏建猷),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十分珍惜自己“忧患余生”的晚年,但仍把这最宝贵的生命余晖奉献给了上海师范大学,为振兴历史系与创建古籍研究所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程应镠主持历史系工作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历史系百废待兴。